

春秋公羊学与
西汉文学

李华雍◎著

桂苑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桂苑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春秋公羊学与 西汉文学

李华雍◎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文学 / 李华雍著. —广州: 世界图书
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5

ISBN 978-7-5100-7838-5

I. ①春…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
②《公羊传》—研究 ③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西汉
时代 IV. ①K225.04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321号



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文学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3 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7838-5/K · 0198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汉春秋公羊学论略	10
第一节 《春秋》经与西汉今文学派的阐释	10
第二节 西汉公羊学对其他学派学说的吸纳	20
第三节 春秋公羊学在西汉的盛衰轨迹	30
第二章 公羊学天人合一理论与西汉文学表现	48
第一节 公羊学的天人合一理论	48
第二节 西汉文学对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	62
第三节 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神秘成分与西汉文学	78
第三章 公羊学大一统理论与西汉文学表现	95
第一节 公羊学的大一统学说	95
第二节 汉赋对大一统理念的表现	106
第三节 《史记》与大一统思想	119
第四章 公羊学与西汉文士的人生追求	131
第一节 儒学理想与个体追求的矛盾	132
第二节 大丈夫精神与臣仆人格的歧异	148



第五章 公羊学与西汉的文风	162
第一节 文风的政治功利化	162
第二节 文风的学者化倾向	175
参考文献	189

绪 论

文学与政治发生联系，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就现象的广泛性与二者联系的紧密性而言，古代中国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在古代中国，西汉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程度，则最具典范性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运祚绵长的专制帝国（夏商制度难考，周则为松散的封建制，秦虽为第一个专制帝国，但仅仅存在了二十余年，故未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在很多方面对后代王朝有着借鉴、模范作用。西汉时期，独立的文学并不存在（众所周知，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是东汉之后的魏晋时期的事），西汉文学因与政治关系过分密切，以至于成为政治的附庸。西汉文学的这一显著特征，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这甚至成为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差别仅仅在于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当时政治的附庸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所以，研究西汉文学，若脱离政治来谈“纯”文学，是完全隔膜的。政治对文学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达成的。而西汉时期的主流思想，从高祖立国到武帝初期，是黄老道术，武帝亲政之后直至西汉灭亡，则是儒学。两相比较，黄老道术存在时间较短，仅七十余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学术文化相对自由宽松，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仍在，黄老道术还没有能够对文学起到主导作用。儒学独尊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武帝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之后，儒学成为帝国的治国根本指导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它对社会的影响力一天天地加强，儒学的意识形态渐渐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到儒学影响达到最顶峰的元、成、哀、平帝时期，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成为规范社会与人伦的最高真理、规范。这样，儒学就进入到包括文士在内的几乎所有知识精英的内心深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思维方式、思想内涵与价值取向，



都深深地烙上了儒学的印记。而西汉的文学之士，其第一身份不是文人，而是学者，那么，这些文士所学、所宗的儒学，到底能够对其思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进而会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成为研究西汉文学的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了。

西汉儒学包含着诸多复杂的问题。首先，西汉的儒学是以经学的新形式出现的，它与孔孟的原初儒学有很大的不同，它已掺杂进很多战国以来尤其是西汉时期的时代文化成分，比如阴阳五行思想、专制思想等。其次，就门派而言，西汉经学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派为争夺学界主流而一直在明争暗斗，虽然前有刘德、刘余后有刘歆的努力，终西汉一代，古文经学始终处于在野的不利地位，传学者少，故社会的影响力有限。今文经学则不同，它在汉初就确立了对古文经学的优势地位，董仲舒这位今文公羊学大师又将这种优势地位绝对化，因而，今文经学成为西汉的主导思想。再次，在今文经学内部，还有着《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的地位争斗问题，《春秋》由于与现实政治关系最密切，而且它有最优秀的宣传者董仲舒为之鼓动，所以成为西汉一代今文诸经之冠冕。最后，在《春秋》经的内部，还存在着《公羊传》与《谷梁传》的争斗。但《谷梁传》立于学官远远晚于《公羊传》，并且它的义理多取自《公羊传》，所以，尽管有汉宣帝的支持，《谷梁传》学与《公羊传》学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考察《汉书》所载西汉《春秋》经大师与信奉者，也确实多为《公羊传》学派的。

所以，在西汉，学术正统是今文经学；在今文经学中，春秋公羊学是超越其他经典的最有影响力的显学。西汉及后世学者、文人经常提到的西汉“儒学”，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乃是指春秋公羊学，本书中所提到的“儒学”，无特殊说明，都是指春秋公羊学。

一、选题的意义

西汉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公羊学思想的反映，但它同时又是文士个人情感的体现，二者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又是不分你我的，因而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西汉文士普遍具有忧患意识，它既可以表现为对汉政的歌颂与批评，又可以表现为对自身境遇的思考与个人悲欢情绪的宣泄，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或多或少地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公羊学发生着联系。本书即努力寻求这种微妙的联系，以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为切入点，从纵向上考察这一学说对文学发展的史的影响，从横向里切入审视它对具体

的文士、作品的具体影响所在。探究公羊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其实就是考察思想、文化、政治是如何作用于文学的这一问题。本研究既有纯文学研究的价值，也有鉴古知今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分析

在研究公羊学与西汉文学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考察公羊学本身作为经学的性质与特点，亦即经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状况，以及公羊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一）公羊学的经学史的研究

在这一领域，晚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是最早的研究经典。但皮锡瑞今文经学家的意识超过了理性研究者的自觉，所以他轻诋古文经学，而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过度推崇，甚至溢美，有失客观公正。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与皮锡瑞不同的是，康有为的著作更为集中细致地分析、推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与康有为的著作一样以公羊义理为研究对象的，还有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对公羊学的评价较皮锡瑞、康有为两位客观，但还是难以摆脱经今古文的纠缠，而缺乏现代学术的意识。段熙仲教授《春秋公羊学讲疏》虽然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整理公羊学，但作者对公羊学的所有方面（尤其是经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澄清了很多历史遗留的难题，显示出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相对而言，周予同以公允的立场、理性的评判而成为迄今为止成就最大的经学史研究专家，由朱维铮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摆脱了学派意气之争的狭隘，以理性的批评精神来审视、研究公羊学等经学门派的经义，完全将之视作为研究古代文化、思想的文献材料，所以创获最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学者如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内含《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西汉经学史》二种）、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等人也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尤其是王葆玟，以现代的学术研究精神来观照公羊学研究史中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对很多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公羊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

因为公羊学在西汉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所以，研究西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著作，



必然绕不开公羊学和董仲舒。思想史方面，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五册）较集中地讨论了公羊学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关系问题，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是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一部两汉思想史的著作，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则集前人研究之成果并提出了一些新见，此外，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三卷本）、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也都各有优长。针对公羊学大师思想的研究，有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学术史方面的著作，有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马勇的《汉代春秋学研究》、赵伯雄的《春秋学史》等。唐著以考证见长，刘著是最有裨于学界的一部汉代学术史资料长编，马著梳理了西汉公羊学大事与西汉研习公羊学的学者情况，顾著则以疑古精神审视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赵著则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春秋各派的情况，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深入到了公羊学思想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状况。

（三）公羊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探及公羊学与其时代、文化、政治的关系，较有代表性的有：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刘黎明的《春秋经传研究》，许雪涛的《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张端穗的《西汉公羊学研究》，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等等。^[1]

因为本研究的文学属性，所以在此仅胪列公羊学与汉代思想、文化、政治关系的代表性研究专著，对于数量众多的此类研究论文，详见书后参考文献的“论文”部分，在此不再罗列。

（四）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文学关系的研究

较早的这方面的研究，零散地见载于古人的文集中，例如洪迈的《容斋随笔》、刘熙载的《艺概》等。民国以来，开始出现专业、集中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有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进展，汤仁泽的《日本的公羊学研究》有较为详尽的介绍。但汤仁泽先生的文章

[1]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许雪涛：《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端穗：《西汉公羊学研究》，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仅集中于历史研究领域的介绍，对日本的与公羊学相关的文学研究则没有介绍。西方汉学家研究公羊学，就笔者的有限了解，也是专注于思想、文化方面，而少有文学方面的探讨。

1. 经学与汉诗的关系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的第十四章探讨了汉乐府反映汉代学术思想斗争的问题。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的下编，对西汉统一与汉诗创作繁荣、汉代诗人思想变革的意义、汉代社会生活变化与诗歌的互动等系列问题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公羊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论文有万光治的《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等，数量很少。^[1]

2. 经学与汉赋的关系

冯良方的《汉赋与经学》全书十一章，从汉赋与经学“同体共生”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两者亲和、悖离的文学现象与深层本质。政治与文化环境的转变对作家主体的影响，经学造成作家内在矛盾并进而影响其汉赋创作，经学理论的内在矛盾对于汉赋的影响，这三方面是著者着重研讨的，并且也是颇有创获的。台湾学者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在论及汉赋价值的成因时，简单地谈到了西汉经学的影响。董治安的《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所收《汉赋的困厄与解脱》一文，也探讨了汉赋与今文经学的关联问题。^[2]此外，万光治的《汉赋通论》与侯立兵的《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的研究，也涉及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在西汉文学研究领域，与汉赋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有刘松来的《经学衰微与汉赋的文体升华》，黄震云的《汉赋与儒家思想》，李桂荣、郑明璋的《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苏羽的《论汉赋的学者化转型》等。^[3]

3. 经学与西汉文学的关系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较之前一类专门针对汉赋的研究著作，研究的面更广泛。该书分三编，下编以文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两汉经学与两汉文学的互动关系，作者力图揭示出经学语境中文学的独特话语方式，努力描述经学在两汉文学的

[1] 万光治：《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

[3] 康有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深刻的影响。^[1]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也以两汉文学为考察对象,以经学为视角来观照两汉作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全书分“汉代经学及其思想文化影响”、“经学与汉代作家及创作”和“经学与汉代文学观念”三个部分,既探讨了经学理论的问题,也对两汉文学的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是今年以来少有的研究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力作。^[2]类似的也有以两汉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的,但不同于刘松来、边家珍两位将经学作为唯一视角,而仅将经学视为多维研究视角中的一种的,还有李炳海的《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及龙文玲的《汉武帝与西汉文学》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吴汝煜的《〈史记〉与公羊学》,陈桐生的《〈史记〉与春秋公羊学》,康宇凤的《浅谈〈史记〉对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等。^[3]

4. 经学与西汉文学理论的关系

郁积意的《经典的批评——西汉文学思想研究》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作者认为,西汉经学在统治者的鼓吹下,使得文士变得更有抱负,更加的理想化,经学与政治融合为一体,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成功地改造了文士的思想。文学因此成为政治与道德功利主义表现的载体。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探讨了经学一统与西汉文艺的审美取向问题。^[4]汪春泓的《齐学影响下的西汉文学》探讨了武帝至平帝时期经学的盛衰情况以及文学由外向评判转向内向自省间的关系。此外,涉及经学与西汉文学理论的研究著作,还有于迎春的《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程勇的《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等。^[5]研究论文有王焕然的《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霍炬的《董仲舒与西汉前期文论理论前提的建构》等。^[6]

三、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本书的研究设想

就整体而言,与数量众多的公羊学历史、文化、思想研究相比,研究者对公羊

[1] 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焕然:《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3卷第5期;霍炬:《董仲舒与西汉前期文论理论前提的建构》,陕西师范大学2002届硕士毕业论文。

学与西汉文学关系的关注，还是相对薄弱。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学者或是在研究经学时触及西汉文学，或是在研究西汉文学时偶尔触及经学问题，很少有专门针对经学影响文学而进行的专项研究，在上述为数甚多的著作中，仅有三部：冯良方的《汉赋与经学》、刘松来的《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和边家珍的《汉代经学与文学》。冯著把研究重心放在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上，边著和刘著则考察了经学与汉代作家及其创作的关系、经学对汉代文学观念的影响等问题，较为全面。

这些时贤的研究成果对笔者颇有启发，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一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研究略显陈旧，最近的研究也已经是2007年的了，近两年此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说明学界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认识还不够，可挖掘的空间较大。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成果在研究点与面关系的处理上不尽如人意。他们的研究范围或是过于宽泛，如边家珍的著作全书25万字十三章，以两汉为时限，以所有的十几种今古文经为考察出发点，显得面过宽，难以以有限的篇幅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刘松来的著作问题和边家珍的著作略同；或是过于拘泥于某一种文体，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如冯良方的著作的专注于汉赋研究，这本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若加入史传文、诗歌等其他西汉的文体进行整体考察，效果或许更好。

在前辈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的设想是，要做相对专精的研究，要兼顾点与面，合理缩小研究范围。在汉代经学各科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首推春秋公羊学，那么就把它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时限方面，东汉是古文经学的天下，今文春秋公羊学衰微，对文学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就放弃东汉文学，而以西汉文学为唯一的考察对象。

所以，笔者的设想是以西汉文学的全体为研究对象，以春秋公羊学为研究切入点，来探究这种思想文化对一代文学的影响。至少在目前，和笔者有相同构想的研究专著还没有。

四、本书的内容

本书分五章。第一章厘清西汉春秋公羊学的一些相关问题，第二章与第三章探究公羊学两大核心理论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情况，第四章研究公羊学对文士心理与人生选择的影响情况，第五章则是专门针对公羊学影响西汉文风程度与方式的研究。

第一章“西汉春秋公羊学论略”，重在探究公羊学的发展演变与义理内涵。第一节“《春秋》经与西汉今文学派的阐释”，澄清西汉时期《春秋》经、公羊学《春



秋》及公羊学与西汉其他今文《春秋》学派的关系等问题；第二节“西汉公羊学对其他学派学说的吸纳”，探究西汉春秋公羊学之吸纳诸子百家学说而集大成的问题；第三节“春秋公羊学在西汉的盛衰轨迹”，简述公羊学在西汉的盛衰演变情况，并做出自己的评判。

第二章“公羊学天人合一理论与西汉文学表现”，天人合一理论是公羊学的思想基础，对于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第一节“公羊学的天人合一理论”，厘清公羊学天人合一理论的内涵以及它在西汉不同时期的影响情况；第二节“西汉文学对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探究公羊学天人合一理论在西汉文学中的种种表现；第三节“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神秘成分与西汉文学”，更进一步探讨公羊学天人理论中的神秘成分如灾异祥瑞、谶纬等思想在西汉文学中的表现。

第三章“公羊学大一统理论与西汉文学表现”，大一统理论是公羊学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西汉的文士基本上都将大一统视作是天经地义。第一节“公羊学的大一统学说”，先审视公羊学大一统理论的内容；第二节“汉赋对大一统理念的表现”，考察汉赋表现大一统理论时所使用的方式、所展示的内容；第三节“《史记》与大一统思想”，考察《史记》对公羊学大一统理论的继承与扬弃及其文学体现。

第四章“公羊学与西汉文士的人生追求”，本章研究公羊学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汉文士内心的影响、改造问题。第一节“儒学理想与个体追求的矛盾”，文士受公羊学宏远政治理想的影响而忘我进取，但他们也意识到集体消融了他们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到自己个性泯灭于共性中的矛盾、痛苦。第二节“大丈夫精神与臣仆人格的歧异”，公羊学鼓舞文士以大丈夫精神自立，但现实的诱惑、压迫则将文士引向蝇营狗苟的臣仆化的人生道路。不同的文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文学表现，都显示了公羊学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第五章“公羊学与西汉的文风”，本章研究公羊学对于西汉整体文风的影响情况。第一节“文风的政治功利化”，受到公羊学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西汉中期以后的文士主动将文学创作归入政治附庸的地位，将文学视作为辅助政治、表现儒学理想的工具，因此，西汉文风的第一个突出特征是严重的政治功利化倾向；第二节“文风的学者化倾向”，因为公羊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所以，汉武帝之后的文士多兼具经生的身份，文学在对经学发生有限影响的同时，更被经学严重侵蚀，西汉的文学没有独立性，越到后来，文风的经术化、学者化的倾向就越是明显。

五、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将在理清西汉春秋公羊学发展脉络、思想特质、文化影响等问题的基础上，全面考察公羊学这一西汉统治思想对西汉作者之人格塑造、西汉文风、文学主题等方面所施加的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本书希望通过宏观考察与细节分析结合的方式，部分地解决思想文化对文学的作用这一虽嫌老旧但至今仍未彻底厘清的问题。

六、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本书所研究的与西汉文学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全部以春秋公羊学思想为考察的出发点，探究思想与文学的互相作用问题。

本书以西汉全部诗、文、赋作为研究对象，以两汉相关非文学的文献资料为参照，上探先秦文献，把相关的材料提取出来，认真排比研究，收集材料力争做到涸泽而渔。本书将酌情采用政治学、历史学、民俗学、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通过分析和研究西汉文学题材变异之文化背景、主题变化的内在规律、作者创作倾向的歧异、创作技巧的演进等，力图揭示西汉文学与时代思想文化两者间潜在的深层联系，争取建立一种主次分明的、宏观把握与微观体察有机结合的最佳研究途径。

具体研究时选择运用上述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并用，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本书将谨守文学的本位，避免使该文偏向思想史研究、政治研究或文化研究，虽然思想史研究、政治研究、文化研究也是本课题所必须涉及的。

相对于时贤的论著，本书将更加注意，并努力探求研究面与点的最佳结合点：研究的时段限于西汉文学，研究的切入角限于春秋公羊学，探究这种在西汉处于独尊地位的思想文化是怎样对一代文学发生影响的。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西汉的意识形态主体，春秋公羊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即便将范围仅仅限定在文学领域，也是头绪纷杂，问题众多。限于时间和篇幅，本书不能够全面探讨公羊学之于文学的各种作用，而只能够选择几个主要的方面来研究，所以，难免挂一漏万之缺失。对公羊学影响文学作尽可能的全面分析，将是笔者今后的主要工作。

第一章 西汉春秋公羊学论略

在具体研究公羊学作用于文学这一核心问题之前，本章力图对公羊学在西汉的发展演变轨迹在尽可能简洁的“述”的基础上加入笔者的“论”，以求对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学说内涵、兴衰过程和该学派大师的观点有整体、客观的把握，以此为基础，才能够对西汉文学大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内涵有深入的理解。

第一节 《春秋》经与西汉今文学派的阐释

“经”字，甲骨文中未见，首见于金文。^[1]《说文解字》解释为“织”，段玉裁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2]可见，“经”有核心、中坚之义。以经称书，始于战国，当时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几乎都称自己学派的重要典籍为经，例如《墨经》、《道德经》等即是。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在没有确立独尊地位之前，也是如此。但在汉武帝的表彰之后，儒家独尊，其他学派皆为旁门左道，自然也就被剥夺了称本派重要文献为经典的权

[1]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第二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利。武帝之后，“经”成为儒家最重要文献的专称。^[1]

“经”既已有专门指向，“经学”于是应运而生。“经学”一词，见于《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这里的“经学”，已经大致具备了汉代经学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无经学，西汉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学”。西汉的经学，有如下三个主要特点。

（一）经学的神圣化与神秘化

汉代经师对经学的神化，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儒学的奠基者孔子的圣化。扬雄说：“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2]《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文：“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二者虽有溢美，基本上还是较为理性的评价。但何休注则在对《公羊传》颂美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孔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引荒诞神秘的纬书《演孔图》来神化孔子作《春秋》，已经走到了极端。而西汉中后期极度盛行的辅经而行的纬书，也被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3]荒诞的纬书的圣化，反过来圣化了孔子与经学，这是一个互相推波助澜的造势运动。

（二）经学的阴阳五行化

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极为盛行，它是古人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因而是此时期最核心的“科学”。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中

[1] 例如，刘熙《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2]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中华书局1987年版；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许雪涛：《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端穗：《西汉公羊学研究》，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汤志均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的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多是以最简单、朴实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经验，由近及远，由已知推向未知。比如，古人他们上观天象，发现月满则亏，亏尽则趋生，于是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加入到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中去，归纳出“满招损，谦受益”的道德精义。邹衍将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整合为一个学说，并逐渐壮大了该学说的影响。到了董仲舒，又进一步丰富了该学说，并成功将它吸纳进自己的经学体系中来，从而开创了西汉经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对后来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经学的实用化

西汉今文经学有别于古文经学和后代儒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学以致用。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精辟地归纳道：“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关于西汉今文经学的这一特点，下文将专门探讨，兹不赘述。

在所有儒家典籍之中，有资格称“经”的文献是在不断变换的。先有“六经”之称（又名“六艺”）^[1]，然后是“五经”、“七经”^[2]，再有“九经”^[3]，再衍为“十三经”。在各种称说中，都有《春秋》经，它在儒家群经中的重要地位是永远不变的。

“春秋”的称谓，在先秦时期也是个使用范围很广的泛称，而不是某一部书的专有书名。比如《墨子·明鬼下》提到有所谓“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诸国“春秋”。^[4]《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时，也提到了“春秋”。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

[1]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 汤仁泽：《日本的公羊学研究》，载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7期。

[3]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学苑出版社2002版。